



贵州民族学院学术文库

陈世鹏 著

黔彝古籍举要

学术
文库

贵州民族出版社

XUESHUYUWENKU

陈世鹏

著



黔彝古籍萃要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黔彝古籍举要/陈世鹏著. —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4.7

ISBN 7 - 5412 - 1155 - 9

I. 黔... II. 陈... III. 彝语 古籍 研究
IV. 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7166 号

作品名 黔彝古籍举要
著者 陈世鹏 著
特约编辑 李平凡
封面设计 吕凤梧
责任校对 曹永兰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1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mm 1/32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12.875
印 数 1 ~ 1 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序

黄 平

陈世鹏先生的《黔彝古籍举要》正式出版，嘱我作序。一是因我琐事较多，对其书稿不能仔细研读，所言难以中的；二是彝文古籍浩如烟海，博大精深，而我对彝文古籍了解不多，研究更少。由此，惟恐才浅学疏，词不达意，对不起著者一番美意，更对不起这本书稿。于是我几番推辞，然其一定要我涂鸦几句，推脱不得。

我终于应允了。原因有二：其一世鹏与我同乡、同族，算我的兄长，并说：“百里杜鹃人写的书，想请百里杜鹃人作序”，斯人斯情，我怎好不从？其二作为彝人，《黔彝古籍举要》出版，是对彝族文化的一份贡献，我自当欣喜与支持。由此而言，于情于理，我都应允。

世鹏生长于黔西北，奢香故里，百里杜鹃腹地即是其出生地。家传有良好的学风，其祖父和父亲皆为远近闻名的饱学之士，尤其对彝族文化有许多研究和贡献。也许是钟慧于百里杜鹃的奇山灵木，抑或是秉承家风学范，世鹏自小勤奋好学，才思敏捷。特别是到了中年，毅然放弃过去所学，重新选择彝族文化作为研究方向，并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学习彝文文献专业。学术研究是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尤其是像研究彝族古文字和彝族历史文化这样的内容，更要耐得住清苦和寂寞。世鹏为此舍去了许多过去的爱好和活动，潜心于彝族文化研究，并在几年间取得不少成果，成为贵州民

族学院副研究员。实在值得感佩和祝贺。

彝族是我国西南的世居民族之一,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区。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共有人口776.23万。在历史的长河中,广阔的地域分布,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态环境,使聪慧的彝族人民成为了一个文化积淀厚重的民族。不仅有着自古相传的古文字,而且有着卷帙浩繁的彝族古籍。这些古籍不仅是彝族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哲学、医学、艺术等知识的备忘录,同时对研究西南其他民族的历史也有着重要作用。而贵州的彝文古籍在各省区中藏书最多,收集整理时间最早,影响最大。如《爨文丛刻》、《西南彝志》等彝文古籍早已蜚声国内外。

《黔彝古籍举要》是世鹏对彝文古籍内容进行梳理、介绍和研究的一部力作。书中介绍了这些彝文古籍的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每本古籍的主要内容,并对每本古籍加以评述,揭示其学术价值。彝文古籍多用五言诗行体写成,文句冗长,文辞奥博,不易理解。本书则将数十本彝文古籍融于一炉,利用白话文进行了梳理,使本书在具有史料性的同时,具有可读性和通俗性。在研究这些古籍的时候把其放在相应的彝族文化背景中去研究,并对不少问题有独特见解,使读者通过对本书的阅读,对贵州的彝文古籍和彝族文化有较深刻的认识 and 了解,从而收到管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这也是本书的最可贵之处。

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和人类文化交流的广泛深入,民族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民族古籍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上各民族生产、生活知识和斗争经验的忠实记录。党和政府对民族古籍的抢救、整理和研究历来十分重视。中共中央(87)37号文件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的宝贵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近年来,我省的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国家民委的具体指导下,省民

序

宗委和各地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各有关专家学者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要完成我省民族古籍的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真可谓任重道远!我衷心希望各方面的有识之士都能够进一步关注、关心和支持民族古籍的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为“教书、救人、救学科”作出自己的努力,为子孙后代留下“遗产”作出应有的贡献!

2004年3月于省政府5号楼

前 言

在中国 56 个民族中，彝族是一个分布面广、人口众多的民族。主要分布云南、四川西南部、贵州西北部和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国外如越南、缅甸等国都有彝族居住。贵州彝族共有 81.2 万人，主要分布在威宁、赫章、毕节、大方、黔西、织金、金沙、水城、盘县、六枝、兴义、兴仁、普安等县市特区。20 世纪 70 年代在威宁自治县中水出土的战国至西汉的刻画陶文符号，经有关专家认定是彝族文字。可见至迟在西汉已有彝族先民进入贵州。彝族先民和其他民族一道为开发黔西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创造了自己光辉灿烂的文化，用彝文写下了许多珍贵的典籍。

彝文古籍主要是指用彝文写成的各种古书和将各种古代彝文金石碑刻辑录成集的书。一般没有具体的作者和具体的写作年代，多为民间手抄本，木刻本很少。流传下来的木刻本有云南省武定县的明刻本《太上感应篇》（亦称《劝善经》），四川有刻于清光绪年间的《玛牧特衣》（教育经典），贵州有刻于清光绪年间的《摩史书》。清代改土归流之后，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还处于典型的奴隶制形态，乌蒙山区和哀牢山区大部分地区的彝族也不同程度地处于封建土目领主的统治之下，民间还保存着大量的彝文古籍。而一些发展到地主经济阶段的彝族地区，由于布摩（祭司）和摩史（乐官和史官）地位的下降，不少彝文古籍已经散失。鉴于以上原因，学术界一般将彝文古籍的下限定为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于上限至今尚无定论。此外，由于彝文古籍历遭浩劫，因此，对于书虽

已失传,还仍然装在群众脑中,流传在群众的口头上,反映着彝族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口碑古籍也视为彝文古籍。

彝族有着自古相传的古文字。彝语属词根语,词形在句子中不起变化,词在句子中的各种语法主要靠词序和虚词来表达。作为记录彝族语言载体的古彝文属表意文字,一个字表一个音节。彝文古籍的行文次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直行排列,以五言句式为主,间杂三、四、七、九言。其内容广博宏富,系统地、全面地记录了彝族社会中的诸多文化事象和文明成果,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早就引起了封建王朝的重视和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垂涎。明代统治者为了更好地推行“以夷治夷”的政策,培养自己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代理人,要各地土司子弟入学学习汉文化,否则就不能袭替土司职位,并在会同馆和四夷馆设专人编写了多种少数民族语文与汉语对译的《华夷词语》。1931年在故宫发现的42种71册彝文古籍中就有云、贵、川地区彝语文5种。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主义者打着“传教”、“探险”、“旅游”、“科学考察”的幌子,在祖国的大西南广泛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进行文化侵略。许多彝文古籍也成了他们掳掠和盗劫的对象。法国亲王奥尔良曾在云南、四川将大批彝文古籍运送到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在云南“旅行”的保尔·博厄尔也将收集到的彝语词汇送给巴黎东方人学会。法国 Dolon 在其《最原始的野蛮人》一书中说仅在清朝末年就有2000多本彝文古籍流落到欧洲。至今在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馆藏书室、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法国巴黎天主教外国教会、法国巴黎民族志博物馆、安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迷哇基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等均有彝文古籍藏书。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我国的一些学者也开始重视彝文古籍的搜集和研究工作。著名民族学家杨成志先生在云南工作期间,曾收集70余部彝文古籍,他所著的《云南保保族的巫师及其

经典著作》、《中罗字典》、《云南保保的文字》等开了彝文古籍研究的先河。1930年我国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在云、贵、川三省搜集了十多部彝文古籍，经彝文翻译家罗文笔先生翻译后出版了《爨文丛刻》，为弘扬彝族古籍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40年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先生在云南搜集了2000多册彝文古籍分藏于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北平图书馆及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图书馆。建国初期中国科学院原川康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第四语言工作队在滇、川、黔、桂地区工作期间也先后搜集了一批彝文古籍，后均被有关单位收藏。贵州西部与滇东北、川南比邻，从蜀汉年间开始彝族先民在这块土地上曾先后建立过水西、乌撒、扯勒、芒部、播勒、阿望惹等地方政权，在史书和地方志中记载的就有罗甸、罗殿、罗施鬼国、自杞等小方国。这些地方政权曾统治贵州西部长达一千多年，由于政治上的相对稳定，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彝族地方政权中的布摩(祭司)和摩史(乐官兼史官)用彝文撰写了大量的古籍，贵州彝文古籍虽在历史上多次遭到兵燹之灾，损失十分惨重，但藏书量至今仍为全国之冠，仅毕节地区就有4000~5000册。其他如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室、六盘水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六枝特区民族宗教事务局、盘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等单位均有彝文古籍藏书。

解放后，贵州彝文古籍的整理工作在全国开展得最早。为了满足学术界对彝族文化研究的需要，贵州省毕节地区专员公署民族事务委员会于1955年成立了彝文翻译组，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有领导有组织的彝文古籍整理工作。从1955~1966年间共计翻译了彝文古籍25部51卷约80万字。其著名者如《西南彝志》、《水西制度》、《六祖纪略》、《吴三桂入黔记》、《洪水泛滥史》等。“文革”期间，彝文被视为巫师文字，彝文古籍被斥为“封资修”的东西，许多散存于民间的和毕节彝文翻译组搜集的彝文古籍原本被没收、烧毁、散失，翻译人员被打成“牛鬼蛇神”遭

散回乡,彝文古籍又一次遭到历史的浩劫。打倒“四人帮”之后,党和国家对民族古籍的翻译整理工作十分重视。1977年10月经贵州省委批示才又重新恢复了原毕节彝文翻译组的建制。彝文古籍整理又获得了新生。1979年国家民委签发的[79]341号文件中指出:“彝族历史文献需要继续搜集和整理研究,请各有关地区和有关部门引起足够重视。为了落实此项任务,首先要发挥现有科研组织机构的力量……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的有关科研、教学单位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人力和藏书的条件,把整理和研究彝族历史文献的工作列入本单位的科研规划,并且迅速付诸实施。”中共中央[81]37号文件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的宝贵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国家民委179[81]号文件再次指出:“少数民族古籍目前亟待抢救、收集整理和研究。我们希望有关科研、教学藏书单位,根据自己的人力物力条件,把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古籍的工作列入本单位的科研规划,并迅速付诸实施。同时希望有关教育文化和出版部门重视培养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人才和少数民族的出版工作。”在上述文件的正确指引下,彝族古籍的收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得到迅猛的发展。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等高校都设立了彝文专业,培育了一大批整理和研究彝文古籍的人才。中央民族大学彝学研究所、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四川凉山民族研究所、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云南红河民族研究所等研究单位纷纷成立。云、贵、川三省的民族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不少彝文古籍。彝文古籍文献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正在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

彝文古籍从不同的角度划分有不同的分类。按传承人分贵州彝文古籍,可分为“布署”和“摩史署”。“布署”是彝族祭司——布摩使用的彝文经典,如《献酒经》、《指路经》、《祭龙经》、《鸡卦经》、《解冤经》等。“摩史署”为摩史在庆典、恋爱、结亲嫁女、丧祭

等礼俗场合吟颂和演唱的诗歌,如《曲谷》、《阿买凯》、《凯洪》、《鲁呕》、《把署》等。按地域分贵州彝文古籍,可分为乌撒古籍、水西古籍和水东古籍。古乌撒地区包括今贵州省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和赫章县的部分地区。当地的彝语属东部方言乌撒土语,是贵州彝文古籍最多,彝族传统文化保持比较完整的地区。如《六祖源流》、《彝族创世志》、《彝族诗文论》、《物始纪略》等皆属于乌撒古籍。水西地区包括今贵州省的大方县、黔西县、织金县、纳雍县和水城县、毕节市、金沙县的部分地区。该地区的彝语属东部方言水西土语,其古籍文献十分丰富,如《西南彝志》、《爨文丛刻》中的《把署》、《献酒经》、《祭龙经》、《解冤经》、《玄通大书》等古籍和大多数的金石碑刻、岩刻皆出自这一地区。水东古籍指流传于彝语东部方言盘县次方言区及周边地带的彝文古籍。主要分布在六盘水市的盘县、六枝、水城;黔西南自治州的普安、晴隆、兴仁、兴义;安顺地区的关岭、普定等地。该地区的彝文古籍数量不少,但是翻译整理公开出版者不多。彝文古籍按内容分,可分为哲学、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谱牒、天文历法、地理、伦理、民俗、医学、医药、建筑、宗教、工艺、美术等门类。

彝文古籍不是孤立存在、僵死的书面文化,它乃是一种立于纸上的活文化,它不是花前月下的无病呻吟,而是为一定的民俗事象服务,具有明显的实用功能。例如《爨文丛刻》中的《解冤经》、《指路经》、《祭龙经》等宗教经典,都是布摩在不同的宗教仪式中念诵的经文,而《西南彝志》则是彝族的摩史在各种礼俗场合中演唱的诗歌集成。研究这些彝文古籍时,只有把它放在原初的生态环境中才能洞悉其中的文化意蕴,探索其中的真谛。本书列举了贵州彝文古籍中目前已正式出版的反映彝族哲学、政治、军事、经济、伦理、文学、民俗、历史、天文历法、工艺等方面的部分代表作,介绍了这些书籍的收集整理过程、翻译和出版情况,并对其中的主要内容分别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在每本书籍或一些重要篇章之后加以评

述,揭示彝文古籍使用的文化背景、历史价值及其学术价值,分析某些学术理论框架的构建,使人们能通过这部作品对彝族古籍乃至彝族文化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和了解。同时还引用有关的汉文古籍与之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彝族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联系。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肯定彝族文化的同时,对其中的糟粕进行了批判。

本书中选用的彝文古籍主要有《西南彝志选》、《宇宙人文论》、《土鲁宾吉》、《彝族创世志》、《彝族源流》(共七集27卷)、《黔西北彝族美术·那史·彝文古籍插图》、《增订彝文丛刻》(上、中、下)、《彝文金石图录》(第一集、第二集)、《益那悲歌》、《物始纪略》(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彝族诗文论》、《论彝族诗歌》、《论彝诗体例》、《曲谷精选》、《曲谷走谷选》等十余部彝文古籍名著作了介绍,并附录了《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其中《西南彝志选》是摩史文化的代表作,原书彝名为《哎哺啥厄》,有彝文37万字,400多个标题,反映了彝族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民俗等方面的知识,被誉为研究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原译本,共26卷,新译本已出版了12卷,其余各卷将陆续出版。

《西南彝志选》为其节选本,基本能反映原书的概貌。因《西南彝志》尚未出版完,故选用《西南彝志选》。《增订彝文丛刻》中的《指路经》、《解冤经》、《献酒经》、《祭龙经》、《玄通大书》、《呗摩献祖经》等则是布摩文化的代表。彝文宗教经典是彝文古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神意外衣的掩盖之下,里面富藏着彝族文化的大量信息,反映着彝族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但由于出版和其他条件所限,至今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经书出版。《增订彝文丛刻》为我们研究彝族古代宗教和其他文化事象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宇宙人文论》和《吐鲁宾吉》是彝族科技古籍方面的代表作,主要反映了彝族的天文历法和医学理论方面的成就。《彝族诗文论》和《论彝族诗歌》、《彝诗体例》则是对

彝族诗歌创作理论的概括和总结。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之下,使得彝族诗歌创作更加丰富多彩。《彝文金石图录》收集了彝族古代的部分钟鼎文、岩刻和碑刻,彝文金石刻是彝文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是彝族历史的契券。它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彝族的传统文化。《彝文典籍目录》介绍了贵州毕节地区彝文典籍的藏书情况和每本书的大体内容,并按内容对书目作了分类。由于彝文古籍多具有综合学科的组合性质,就出现了同一本书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类目的情况。另外,还有书名相同而内容不同的情况,如《把署》、《曲谷署》是彝族民歌的两个大类,两本《把署》或《曲谷署》书名虽然相同,但是内容往往不同,因此,也有同一书名反复出现的情况。本书对《彝文书目》中不同的书目作了统计,共有395个不同书目。由此可见,还有大量的彝文古籍需要我们去收集、整理和出版。《黔西北彝族美术·那史·彝文古籍插图》收集了彝文古籍中的各种插图汇编成册,反映了黔西北彝族美术的发展情况和插图的文化内涵。《物始纪略》是彝族先民对许多事物起源的记载和解释,是研究彝族古代哲学的重要典籍。《彝族创世志》重在记载彝族布支系的谱系,其中的艺文志记载了大量的《把署》和《凯咪》,介绍了《凯合呗》的演唱程序。《益那悲歌》反映了彝族和古夜郎的关系,为夜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曲谷精选》和《曲谷走谷选》则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彝族情歌的演唱程序和内容,揭露了封建领主制度对彝族男女青年爱情的摧残和彝族青年对婚姻自主的向往。《阿买恩》则辑录了彝族的许多婚嫁歌,为研究彝族的婚姻习俗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本书原为贵州省教育厅资助的科研课题,本书的出版得到贵州民族学院出版基金的资助,特在此表示感谢。文中有不妥之处,乞望专家指正。

2003年笔者于花溪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西南彝志选》	(1)
第二章 《彝族源流》(1~27卷)	(30)
第三章 《彝族创世志》	(74)
第四章 《宇宙人文论》	(93)
第五章 《土鲁突吉》	(106)
第六章 《黔西北彝族美术·那史彝文古籍插图》	(121)
第七章 增订《彝文丛刻》(上、中、下)	(127)
第八章 《彝族诗文论》	(218)
第九章 《论彝族诗歌》	(232)
第十章 《论彝诗体例》	(242)
第十一章 《彝文金石图录》第一、二集	(248)
第十二章 《益那悲歌》	(260)
第十三章 《物始纪略》第一、二、三集	(289)
第十四章 《曲谷精选》	(328)
第十五章 《曲谷走谷选》	(343)
第十六章 《阿买恳》	(354)
附录《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	(386)
后记	(396)

第一章 《西南彝志选》

《西南彝志》，原名《哎哺啥厄》，是清代末期贵州省黔西州彝族热卧土目家的摩史（歌师）益果拉埃拔历经数年辑录、整理而成。原版本为手抄本，该书原稿的保存者是贵州省大方县三元苗族彝族乡的陈朝光先生。陈朝光出生于彝族布摩世家，其高祖与益果拉埃拔相熟，深知其书的学术价值，故以纹银四十两为润笔之资，请益果拉埃拔另录一部藏之于家，并嘱其子孙妥为保存。1935年由于当时社会混乱，盗匪成灾，陈朝光恐其书散失，将书装入木箱内再用牛皮和草垫将箱子包裹严实，将其放入屋后岩洞中，并垒一石冢将书箱埋藏。1950年党和人民政府肃清了当地的土匪，陈朝光才从石冢中取出埋藏了15年的书箱。木箱早已朽坏，箱中的书由于受到湿气的长期侵蚀，不少书页已彼此粘结，不能翻阅。他用微火烘烤，再小心翼翼地把书一页一页地揭开，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换上新的封面和封底，使这部旷世奇书得以传世。^①解放后，许多科研部门都迫切希望对民族古籍进行翻译整理，为民族研究提供资料。因此，贵州毕节专员公署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全国人大代表、副专员李仿尧的提议下，于1955年成立了彝文翻译组，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彝文古籍整理工作，彝文翻译组由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直接领导，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在业务上给予指导。在向民间征集彝文古籍文献的过程中，陈朝光先生为了弘扬自己民族的文化，毫不吝啬地将这部珍贵的文献献给了国家。《哎哺啥厄》经彝文翻译家罗国义、王兴友共同努力，呕心沥血十年，终于译出

了初稿,将全书的37余万彝文字,四百多个标题分为二十六卷。对彝文采用国际音标注音、字译、句译、注释的方法进行翻译,根据书中内容取名为《西南彝志》,并油印成册传之于世。原书在建国十周年时曾经送往北京参加民族文物展览,此后一直珍藏于北京民族文化宫。由于当时人力不足,成书时间仓促,对原书的校勘、考证、抄录、翻译都有舛误,存在不少问题。“文革”期间,彝文翻译组曾被撤消,译稿被列为“四旧”展览、批判,翻译人员被遣散回家。十年浩劫结束之后,1977年经贵州省委批示,恢复原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1982年3月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选编了《西南彝志》中的部分篇章,整理为汉文版公开出版了《西南彝志选》,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86年6月《西南彝志》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古籍“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由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负责修订,现已出版了1~12卷,其余各卷正在陆续出版之中。

第一节 创世志

1.《金锁管混沌》:选自原译本卷一。叙述天地未产生之时,天空被金锁锁着,一片混沌景象,只有清气和浊气。清浊二气的运动,产生了哎(影)和哺(形)。哎哺配合变化产生了天的雏形。天神努娄哲打开了天上的金锁,开了银门,哎哺和天空面目出现,日月在天空运行。

2.《蜘蛛撒经线》和《造天地的男女们》:《蜘蛛撒经线》选自原译本卷一。叙述蜘蛛抛青线,老鹰扇动翅膀,转动纺车纺线,老虎丢梭,斑鸠织金线,苍蝇鸣号角,蛇闹哄哄的。它们先织出了天的东方,东方是日出之地,汉语说东方居青帝,彝语称之为纪武吐。又织了西方,西方是月落之地,汉语说西方居白帝,彝语称之为勾

买哪。南方是炎热之地，汉语称南方居赤帝，彝语称之为开阿武。北方寒冷，树头低垂，汉语说北方是黑帝所居，彝语称为过美哲。中央为黄帝所居，彝语称之为谷叔努。天君叫铺赤叩，地王叫蒙皮聂。天上有天父，地上有地母。

《造天地的男女们》选自原译本卷二十二。叙述有九个女子造天，八个男子造地。由尼能丢梭，实勺绘图，少男安织机，少女丢梭，蜘蛛牵线，苍蝇绘云彩，蝴蝶量方圆，老鹰转纺车，共同织天地。

3.《天地进化论》：节选自原译本卷五，主要记述了彝族先民对天地起源、人类起源的认识。他们认为：天地未产生之前，宇宙是空空旷旷的，后来产生了清浊二气。由于清浊二气的运动，清气上升而为天，浊气下降而为地。最初的人类居住在树上，兽与人同在，人与兽相随，后来哎部族的先知耿诺左经过长期观察，教会人扎起草把，点火驱走了野兽。此后人类住到了地上，吃草籽树果，穿兽皮，没有粮食吃。人类不懂耕作、放牧和气候，“树木开花时，就叫春三月；树木花谢了，就叫夏三月；树果成熟了，就叫秋三月；树叶枯落时，就叫冬三月。”男女之间不兴嫁娶，知母不知父，跟禽兽一样，互相交配。后来有一个叫哺额克的人在地上种了五谷，传授了耕种技术，造了犁头耙子，人类才开始兴起了耕牧，并且用纪年树和纪月石来分辨季节、年界、月界。此后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四个季节。哎氏族和哺氏族之间，尼氏族和能氏族之间兴起婚仪互相联姻。天神策耿纪要用洪水泛滥来毁灭人类，“洪水泛滔滔，遍地上凡间，鸭头触着天，群鱼吃松毛，水獭吃松果，麂獐的尸体，像木材成堆，虎烂抛白骨，禽鸟填河谷，人类灭绝了，没人祭天地，无人祭祖宗。”彝族的祖先笃慕由于得到阿鄙额勺（掌管生命之神）的帮助，上了洛尼山，幸免于难。后来与三君之女在拜谷楷嘎对歌成婚，生下六个儿子传下彝族中的武、乍、糯、恒、布、默六大支系。

4.《天地津梁断》：节选自原译本卷五。《天地津梁断》是一则